輔仁大學社會科學院

讓我們在對話中發展知識的關聯性

2015年春 今日社會論壇與社會思想研討會系列活動

【解構始於內‧地方即國際‧歷史在眼前】

時間：2015年4月10日 13：00-16:40

地點：輔仁大學利瑪竇大樓101會議室

主講：Lois Holzman

翻譯：邱依虹

回應人：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持：夏林清（輔仁大學社科院院長 心理系教授)

**夏林清：**

我簡單開一個場：我怎麼認識Lois Holzman和Fred Newman這一隻在美國內部的社會治療，也是美國內部的，他們稱自己為共產主義者的群體。

最早是在1989年左右，我在解嚴前後開始投入到台灣解嚴後的工人運動，再到1997年的性工作者運動，1986年開始，我也和中小學老師一起工作約30年。再往前推，1988年我剛唸完博士，中國時報工會的工人，正在因籌組被打壓而抗爭，那時我還沒有完成我的博士論文，正在想有可能不要博士論文了，因為當時我已經教授升等成功了，所以「博士」對我學位來說，沒有在學院升等的交換價值了！可是，投入運動的五年以後，我覺得還是要拿到博士學位，因為在台灣博士學位可以是我的武器，很多時候可以用我的學歷來多做一些事。

在我寫博士論文之前，我需要完成一個資格論文，所以有一個暑假我到了Boston（波士頓），在Harvard（哈佛）教育學院裡面完成我的資格論文。有一天我在圖書館看到玻璃門上貼了一個廣告，叫Social Therapy（社會治療）。我當時已經做了一些工人的工作，也包括小外包家庭的調查，有一些所謂的左翼的思想。那個時候看到宣傳單，當下想：我唸了多年心理學，還不知道有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和左翼的社會治療，這對我來說還蠻震驚的。所以我去參加了他們的活動。當然我那時候並不認識Lois，我只在他們一個群體活動中看到了Fred Newman，而且我看到了他們一群人坐在那裡，談話和討論。當時只有兩天，聽了一堆他們的談話，只記得兩件事：一個主題，是在談在美國那樣的社會裡，女性的、和商品化的身體與性及女性的經驗；第二個，我記得是在談紐約街區裡的家，很多時候那些家的父母婚姻已經解體了，孩子可能跟爺爺奶奶住，或可能把幾個小孩弄在一起養，我後來才知道那是Brooklyn 的All Stars 的方案的背景社區。我在1989年剛認識他們的時候我並不知道這個方案。

之後我就回台灣了，回台灣工作了再十幾年之後，很疲累，所以我在2002年有三個月研究獎勵支持的時候，就跑去了他們那裡。我去他們那裡的時候，因為我要跟台灣教育部申請錢出去，Newman 所創的東邊機構（East Side Institute），一般學院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所以我同步申請到Clumbia（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學者身份。交流的那三個月，我幾乎是全部時間都待在他們的東邊機構。

2002年，我有機會進入了社會治療的這個社群來了解他們，他們是一群從1960年代開始在美國內部找尋他們自己要走什麼樣路徑的人，裡面有心理學、護理、教育，當然也有理工科的，你會看到有不同背景，你也會看到身心障礙或稱為之「病人」的人群。其實就是一整群的人試圖在美國內部實驗，要一起如何工作，又如何組織自己和別人，在互動中讓關係成為創造發展機會的一種實驗。Lois和我是同代人，他們在美國，由60年代、70年代走到現在，實踐了長長的三、四十年，他們也是一路實驗，一路發展他們的方法。再回到心理學來說，我大概是認識他們之後我才有機會透過他們看到世界上也有其他的唸社工的、唸心理的、唸教育的、唸社會的，非常具有政治性，不是去政治化。在台灣，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些專業教育是讓學習者被移植的專業化教育過程中，強固了他的「去政治性」，好像政治跟自己沒關係。講到政治，就會是一種壓抑的、噤聲的、或者保持距離的。我當時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成立了一個政黨，是一位美國非裔女性發展心理學家出來參選。

所以你們可以想像在2002年，我待在那邊3個月的時候我是興奮的，但是我同時是疲倦的，因為工作很累。我也是一個從左翼的歷史，台灣的特殊情境看我自己身上20年運動的疲累的身心，去接近他們、認識他們。在三個月內，參與在他們群體中的經驗，讓我比較經驗到舉重若輕，就是說歷史經驗是傷、是重的，像我們今天早上談，很多東西其實有複雜的內涵，談起來也會覺得這麼累、這麼慘；身心勞動當然有疲倦，但是如果我們在行動的過程當中，去投入在彼此的關係中，為別人也為自己去創發一種可能性，也讓自己使用跟自己過去不一樣的方式和樣子來行動，其實是可以變化的。我是在這個過程中跟他們成為同志。我會認為我和美國內部這一支社會治療的朋友們志同道合，是同志。2015年的此刻，我逮到一個機會把他們邀到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界來，讓大家彼此認識。

當然比較重要的是，我返回到早上為什麼讓邱依虹先報告，讓她們坐在下面聽依虹的新加坡和迦納經驗：我還是認為，我們自己內部的某一種經驗的複雜和細緻，是需要我們自己首先覺得「自己的事我要自己來」；其他人是絕對可以成為我們的助力和提供我們刺激和參考，也可以教給我們他實驗過程所長出來的好東西，再返回我自己的實踐點，我要怎麼長出我的好東西呢？也許可以融合，也許要選擇得取捨，也許我只有自己走泥巴路上，摸黑走出來，他們永遠是遠方一顆閃亮的星星，但遙遠的一個星也是一個支持，聽的時候回到我們自己，讓我們來聽他們這一條路是怎麼走的！

因為時間只有一個下午，所以我在跟Lois Holzman溝通的時候，我是跟她說，因為他們已經出了很多書，書慢慢大家可以看，所以我請她返回到自己走過來的歷程，她自己怎麼長成自己現在這個樣子，然後她長成這樣子的時候她有哪些是她的體悟和體認，我希望她從這個角度跟大家做個演講。可以嗎，這樣清楚？那我們就來歡迎Lois Holzman！

**Lois Holzman：**

大家好，非常榮幸非常高興能夠在此跟大家認識。我依序的回應夏老師的。很幸運能遇到像夏老師這樣的好同志和好朋友。我基本上是照著我的文本來唸，為了翻譯方便。本來想更要靠近你們，但是器材的原因照顧你們很難，所以坐在這裡好了。我要用三個不同角度來介紹我今天所要講的生命歷程。

第一個是Martin Luther King他生前講的一句話。他這段話是講給美國心理學會當時的一段話。他當時採用了心理學的術語，「不適應」。我們這個世界正需要一個新的國際組織，他把它叫做「國際促進不適應的創作力協會」，這個協會能夠從人與人之間不人道的對待的黑夜，朝向光明的閃耀、晨曦的自由和公平。第二個角度我要介紹的是，我希望你們今天在聽的過程中，甚至於一生下來在生命歷程裡，需要牢記的一句話：人的發展是一種人權。第三個要牢記的是，我們從小被教育灌輸說我們的過去決定了現在，但是馬克思認為我們的現在決定我們的過去。

夏老師要我跟你們分享我現在做什麼、我為何走向這個歷程。我走的路是一條獨立的路，我本身是受過學術訓練的心理學研究員，我的工作是創造機會讓人和他們的社區組織成長和發展。我們的工作是組織環境，讓更多不同的人，不論年齡，不論性別和階級，改變他們的關係，改變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關係，尤其是在地與國際文化中的樞紐關係。我們要重新建立希望、能力和想像力來促進我們與生俱來的人的能力，人是可以自主滿足我們生活上的需求和成長的需求的。我們要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我們跟別人的關係，跟事物的關係，我們人生的感情世界，我們的學習歷程，我們要做自己的創造者。所以我們主要是要改變這個世界，讓大家有機會和能耐發展自己和我們的社群。

我們的工作有很多不同名目和標籤，這些都是我們會被叫的，或者人家怎麼看我們的：社會治療師、生成心理學（Becoming psychology）、社區發展工作、行動的展演家、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等等。我們是社會治療師，這是40年前Fred Newman創立的一個學派－生成心理學，這個東西好像有點玄，它就說我們的人不會停在現在的狀態；我們一直在改變、一直在成長、一直在轉換，這本身就成為一門心理學了；我們也是一個發展社群，這個社群本身一直在發展當中；我們的工作也在發展族群，它有兩個不同面向：作為一個運動的參與者，政治行動其實是在從事個人的再創作，個人的再轉換和改變。政治性的行動需要人和他的身心的展演，所以它是循著馬克思革命式的哲學和激進派的人文角度，人是怎樣改變和創造，它自己又如何相聯繫著環境，和其他人一起發展。另外一個重點是，在後現代的社會進程中，如何徹底的批判和詢問探究現代化框架裡的真實是什麼？什麼又是中立和客觀，以及什麼是主觀？我身為一個後現代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詮釋、也不預測、或者商品化、或者定論、或者解構。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組織持續改變和改進的組織及項目，來讓一群人可以利用我們共同的力量，創造新的歷史性的世界和環境，讓我們的工作存在於社會中。我們在這個社會裡的存在是有歷史性的，我們需要的是個人和組織的關係。我們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如此對待，我們才能夠改變和轉化所做的一切。

我們這種做事的形式是革命性的，40年來，已經擴展到全國各地，發展了一個很大的網絡，由很多獨立組織來運作。我們的組織有兩個最大原則。第一個是自給自足，不靠外來資金運作、不跟政府拿錢、不跟財團拿錢、也不要大學的錢、或者基金的錢，都是靠會員募款。所以我們的募款方式也是一種組織方法，讓會員挨家挨戶敲門、或者站在街頭與群眾講話，讓群眾來了解我們做什麼、讓他們出錢支持我們的工作。這種人與人之間的碰觸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將我們的組織組織起來，活躍起來。因為我們的組織方式和募款方式，讓我們可以非常直接碰觸到美國社會各個階級的人，不管是窮人也好、千萬富翁也好，讓我們重新建立不同的夥伴關係，這個關係可以破解美國權威和社會結構底下的傳統意識形態和政治。

我們第二個工作的原則是創造新的結構，基本的設計是活動要碰撞或者挑戰傳統的夥伴關係。舉一些例子：比如說我們創立了一個工會是給失業工人的，本來工人失業了就沒有工會，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還有創立一個新的學校、給小孩的，這個另類的地方在於知識不是個人化的、教育不是存在於新的知識這種單面的教育方式；我們也創立了治療中心，路徑跟主流的心理學和心理治療是不一樣的，主流的心理學是說感情始於腦，我們要的是把情感的治療放在一個社會中去看待和處理；我們的大學是免費的，不是傳統主流的大學、不需要靠成績，人人都是社會化的、也創立了年輕人的新型項目，主流是明星學校，我們要打破的就是這個；我們也搞政治活動、我們也搞投票選舉，最終的目的不是贏票當選。我們這支路線創立了好幾個不同的活動和項目，其中幾個是年輕人不用當明星，因為大家都有天賦都可以發揮出來：東邊研究所(East Side Institute)是之前夏老師去過的，是一個非營利機構。還有就是社會治療群，下面有五間不同的社會治療中心在美國各地；生命歷程展演是唯一營利的機構，主要針對的是大財團和企業，讓企業工作環境更具人性化。43%的美國人今天是不信任兩黨的，是不喜歡政黨政治的，我們也組織這些獨立選民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和項目不單限於美國境內，我們也跟國際的同道的人合作過，我們的影響是成千上萬的，然後再影響更多世界各國的人。我們所接觸、影響和激發的組織有各方的人馬，每個組織目的不同，我們共享共同的方法，即無論年齡族群，可以一起來創造共同的集體有利於我們人性發展的新環境和新結構。其實我們組織的這種對待人的方法的最主要的概念是「人的發展」。這在主流的有關人的行業中都很缺乏，心理、社工、政治，都很少以人為本來處理人的發展。

可是不要誤會我們所謂「人的發展」，就是主流裡的從內到外、直線型的、有目的性的、前進行的，不是這樣。我們指的「人的發展」是社會性的、是文化的、有創造性的，發展不是發生在你身上的發展，是自己自主自創地與群體之間的發展。所以其實我們發展的路徑顛覆了主流的觀點。第一，是沒有最終目的，也擯除了意識形態的發展。如果我們除掉了意識形態或者最終目標這些大框框，我們就會看到人的主體和創造性會出來，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標。所以我們完全想要脫離什麼是真理，誰有真理，誰講的是最對的，我們完全要將主體放到個人身上，來探討和創造。我們需要完全脫離工具性的、僵硬的、要人去適應環境的主流發展模式，我們需要一種革命性、激進的，人的創造性的方式。有幾個比較關鍵的詞，一個是做法、手法，還有就是運作歷程、組織過程。我們要創造和實驗的是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怎樣產生新的關係、新的發展和歷程。

「展演」是這種新心理學的概念和手法，「展演」是為了創造新的可能性和新的角色、新的心理的解釋。就像演員上了舞台扮演的角色，是多過於個人的，不是他自己的角色，現實生活中也可以這樣做。而且不但要這麼做、我們還必然要這麼做，我們個人和群體才有可能性發展和成長。就像一個新生嬰兒一樣，他一生下來是在模仿，展演他所看到的別人的行為。比如說，小孩講話，即使大多數都是不明不白咿咿呀呀的，大人都是裝作懂得，來跟他們對話，小孩慢慢就學會了如何說話。這是一個非常創造性的過程。

這個聽起來簡單但是做起來非常難。要超越自己，展演完全不知道的角色，甚至是可能都沒有預期過的角色，來做為人的學習過程，讓你不但成為現在的、也是未來的自己。所以其實「展演」就是小孩子的「玩遊戲」。我們都在表演某種角色，在互動的過程中，我們都在成長和學習。下面這張照片是一群年輕人在舞台上表演一個舞台劇演出他們的發展歷程，以「展演非自我」來創造和發展自己。

作為一個語言學家和發展心理學家，我為什麼走上這個路呢？很簡單，我是被別人組織過去和邀請加入的。我是非常偶然地走上了這條路，就像我們家是我第一個上大學，我上大學之前不知道什麼是知識份子，所以走上這條路遇到這一群人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有這樣一群人管這個叫做發展心理學。可是當我接觸到周圍的政治運動參與者和社群裡的組織者時，我恍然大悟，知道這就是我要成為的。

這麼多年以來，我覺得我成功地創造了一種實質上和主流社會不一樣的工作方式和成果，完全破解了結構式和學院式的枷鎖。我帶著學院給我最先進的知識進入社群去參與做實驗，這是一個改變了知識的場域。Fred Newman是我生活中親密的同志，也是我的導師，他是這個學派的創始人，三年前過世。他在1960年代就決定離開結構化的學院，我們管他叫新的進步式的設計師。所以他有很多面向，扮演了很多角色，根本說不完。他是非常不正統的、不乖的革命者、實踐者、方法論者、社群組織者、哲學家、政治策略家、治療師、老師、話劇家、舞台劇導演、作曲者、作詞家......雖然說我親密的導師60年代就離開了學院，獨立工作，我自己在1997年才離開學院。我一邊做著學者，一邊參與他們的社群組織。我跟Fred是知識份子，但我們從事的工作不但是特異的，而且是有創造性、跨界、跨族群和多樣的工作方式。我們寫書、出版文章，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我們也積極挑戰其他的學派，讓他人看到我們的學術方式和組織方式。這幾十年來，我們也吸引了一些基層的獨立學者和運動參與者。基本上我們堅信，我們這種進步革命式的學術派系要有更大的影響力，就要將基層組織者和學者串聯起來。這是相對的，組織可以影響學者，學者也可以激發組織的行動和思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打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隔閡，讓他們共通。

如果你要讓我詮釋我的一生，我只能說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是改變研究者跟被研究者，基層工作者和學者的關係。其實研究者和組織者有很大的共同點，他們都是創造者，他們都在創作，和人群組織一起工作，以達到共同的目的。研究者一般是詮釋者和解說者，對現象和參與的人做解說和詮釋。當我還是青年心理學家的時候，我透過我的組織工作來探討我要研究的課題和對象，從我的組織工作中來吸取和建造我的知識和認識。反過來說，組織者的創造性在於創造事物、形式和一個環境，而且他是創造過程的主體。作為一個組織者，其實你的角色是直接碰撞和激發他人來去創造，讓現在可以成為將來，有一個探討和探險的歷程。所以我的生命歷程是一個研究學者走向一個組織者，組織為了要研究，也研究組織者的雙向的角色。走到現在，有點反過來。以前是組織他人，以讓我能夠做好研究；現在我研究主要是為了幫助我組織他人，且能夠組織地更好。

我生命裡有四個重要的人是我的導師。第一個是Lois Bloom，她是一個女研究者，是我的博士導師。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發展心理學，她教會了我一件事：如果我要研究小孩怎樣學會語言，我不能只待在實驗室，要走出實驗室到小孩子的家和玩耍的地方去觀察。所以如果真的要了解小孩的語言學習歷程，會發現這也是一種展演的歷程。他們是隨著環境而改變的，在家裡和實驗室裡觀察到的是不一樣的，他也會根據他的對象而不同。我這個導師點破了一個謎點，即我們的質性研究可以非常嚴謹，甚至比量化研究還要嚴謹。她其實把我從實驗室推了出去，讓我愛上了研究。

我第二個導師是Michael Cole，他是我當時在Rockefeller大學做博士後時的導師。他教會了我一點，如果侷限在實驗室裡去了解人的認知，那是不可靠的，人的認知會隨著社會和文化環境來轉變。他教會了我心理學和社會科學是非常具有政治性的，心理學家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實際的。他也介紹我認識了Lev Vygotsky。在這兩個導師的影響之後，我找到第三個導師Fred Newman。

我第一次碰到Fred，是剛剛完成博士論文，正跟著第二個導師開始工作。Fred離開學院後從事了他的社區工作，開創了這個學派的革命性的社會治療的方式，我認識了Fred和他領導的社群。Fred教會了我很多東西，最重要的是讓我學會了怎麼走進這個世界。我前兩個老師教我走出實驗室，將實驗室的方法帶到街頭和社會中。Fred教會了我讓我的生命中將實驗室踢走，讓生命更為真實，而不是實驗室的生活方式。所以他鼓勵我成立一種觀摩學習，這個過程讓我自己自身去積極正面且親密的和世界掛鉤、碰撞的，而不再是實驗室裡客觀的觀察者。所以Fred讓我發現我一生中最大的熱忱在於「人的發展」不僅是知識性的、概念化的，而是讓我堅信人是要嘗試多樣性的發展自己，作為人類才能發展的漂亮，這也激發了我從事這種革命活動的熱忱。

我第四個導師不是一個人，而是成千上百一起工作過的人。這是我幾十年來在獨立發展的活動和組織當中所認識的人。我舉幾個例子，比如一個8歲時被認為自閉症的小孩，後來成為我們的社會治療師。他就在社會治療小組結束之前發自肺腑地說：「我很喜歡這個過程，不再是自怨自憐，不再只是關注自己的問題，我喜歡這個小組讓我生活的多姿多彩。」還有一個65歲已經退休的工作人員，她為了照顧她的身心障礙的女兒，當她知道年老還可以寫劇本的時候哭了，寫了一個劇本講述她年輕的時候在曼哈頓貧民區成長的過程。還有一個14歲的年輕人，在紐約貧民區成長，習慣性的叛逆，又很自憐，以負面心態去面對人和事，我們的小組教會了他和他的同伴，怎樣正面的面對事情和人生。我們也組織了一個有趣的紐約市警察和年輕人的劇作工作坊，試著讓警察和年輕人有機會發展出一種有意義的關係（在紐約，警察和有色人種的衝突是很強烈的）。還有美國石油大王在非常偶然的機會裡，給了我們組織10塊錢，他後來成為一個積極的支持者，捐了200多萬美金。通過我們的國際聯合工作，合作項目裡有巴西、日本、南非、孟加拉、英國等等組織者一起開創了很多組織工作；我們其實影響了上百的教育者、青年工作者、醫療工作人員等；遠至烏干達，創立了一系列活動，讓小孩能夠發展和展演自己。我們也跟印度的兩名心理學家學到，他們剛開始只是想要讓他們的工作對象活得更有尊嚴，但經過我們的學習方式之後，知道身心障礙者也可以活得更有創造力，可以更有色彩和更豐富。

其實各式各樣各行各業創造出來的力量始於一個信念：人是可以創造新的組織和新的工作，來達到他們所需與所要的。所以我第四個導師，這些成千上百的群眾教會我一點、讓我知道在實驗室是學不到這些、讓我的眼界更開闊。我現在自認自己是一個組織者，可是我也在做研究。我在走一個獨立路線，我獨立於建構底下的，我能夠讓我自己尋找資源，領導一些人來創造不同的活動，跨國際、跨組織、跨文化、跨世界，可以讓發展歷程改變世界。我們做一些沒做過的事，人才會有變化的機會。

**夏林清：**

我在美國到南方紐約街區裡，就是一個小學教堂。都是黑人，上面高高矮矮一起跨區表演。對我自己而言，台灣一群青少年，年輕的時候做過那樣的工作。但是當我被稱為諮商輔導倒來倒去也倒不正。我經驗到他們從小到大持續募款，有一個42街的活動中心，可以募到把群體組織起來能夠持續發展，對我來說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為我們一開始有創發性，但常常就停了；而他們從年輕幹到老。

**戴伯芬：**

我過去參與了一些社會運動。特別是以前在台大研究所做研究生的時候，參與了蘭嶼原住民反對國家公園，反對核能等運動，這是1990年中期；1990年末期，參與了台北市萬華大理街社區運動；最近兩三年參與了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籌備跟成立的工作。這幾年我參與了台北市遊民的一些田野調查。聽了剛剛Holzman的演講，受益良多。因為一路走來會有很多問題，想要跟Holzman請教。先回應一下剛才的演講和實際經驗中的困惑，想要請教Holzman教授。

首先，我想要提三個問題和徵詢兩個建議。第一個問題是社會治療的定義；第二個問題是社會治療如何運作；第三個是在網絡社會中社會治療如何被改變和改變。

第一個問題，我的背景是社會學，心理學概念上有不清楚的地方，社會治療是不是一種團體治療或者社群治療？特別是治療這種字眼意味著一種特定的人和處境。用社會學的字眼，通常用「賦權」，不用治療這個字眼。Therapy這個字眼剛才有一些討論，如何界定什麼樣的群體要被治療？定義如何選擇研究對象或者介入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社會治療如何運作。剛剛Holzman介紹了一些做法，看起來是教育場域中的做法。剛才跟夏老師請教，其實不僅限於教育領域中介入的工作。比較感興趣的有兩點，第一個是剛提出來的，獨立基金來源。這個對於社會工作者是蠻重要的問題，以台灣為例，財務無法自主的話，接受政府的方式是可以被接受的選項嗎？台灣發展脈絡底下很難跟政府一刀兩斷，財務獨立性如何維持？第二個問題是組織的對象。怎麼樣選擇，反對對象到底是誰？剛剛介紹有政治介入，美國政治氛圍和台灣是有差異的，那麼政治運動是必要的嗎？另外一個是與我第三個問題有關，新的組織問題是，去年台灣經歷了茉莉花（譯註：太陽花）革命，新的組織形式是怎樣？

第三個問題是組織方式的問題。我查了一些資料在網路世界如何運作。最近Iphone推出了一些新的APP程式叫做Project toe，這個程式其實是Internet和online therapy, non-professional。它的操作方式是下載一個免費軟體，這個軟體是如果你覺得想不開想要自我傷害的時候，你就叫toe，如果你願意幫助別人你就幫助別人，所以它是互相的。也就是改變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治療者和被治療者的關係。所有人都可以被幫助，所有人都可以幫助別人。這個APP讓我很訝異，它顛覆和改變了傳統的方式，那麼未來社會治療會不會改變方式和樣貌？

另外有兩個建議。第一個是關於實踐和反思的問題。所有運動者都會面臨作為一個行動者和研究者的角色衝突，我自己常會碰到。我要揭露權力關係到什麼程度？作為一個運動者，要保護弱勢團體，而忽略了弱勢團體的隱而不見的權力關係。作為研究者經常要面對客觀和社會現象，所以作為研究者和社會實踐著的雙重角色衝突一直存在，一直都沒很好的解答，很想聽Holzman怎麼解答。

第二個是獨立資金支持。如果對於社會工作者是重要的，那麼如何保持我們的工作的獨立性。舉兩個例子。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大概人們都認為工會的來源都來自於會費，但實際上我們接受過台北市政府勞工局研究生健保身份認定的問題。工會作為職業團體組織，我看到這個現象。另外一個是社會企業，台北市萬華區街友的城市導覽的方案，用社會企業在執行。如果我們想要獨立國家好像不太可能，如果用社會企業的形式，美國是怎樣做的？

**夏林清：**

戴老師先拋磚引玉問了問題，我讓Lois聽了這些提問她想說的再回到大家。

**Lois Holzman：**

非常感謝。有趣有挑戰性的問題。嚴格來說，社會治療不是一種治療方式。因為我們服務的對象不是有問題有病態的人，我們在場的各位都跟我一樣同意說，有病的是我們的社會而不是個人。Fred常應對的方式是，如果不用治療這兩個字，就沒有人來了。你想想看，如果把名字改為發展歷史學或者發展創造學，你們會來嗎？它是不傳統的，非主流，我們不相信要把一個人改正好。我們幫助支持他人的做法，主要是幫大家幫個人創造新的感情、新的支撐的力量。他可能遭遇到很大的感情衝擊，我們就幫他建立新的感情支持。我們發覺若要幫助個人或者群體在情感上繼續成長的話，我們需要創造一個有力量的族群，讓這個族群創造一種力量，來發展個人的力量。主流的心理學和心理治療將我們個體化，也把我們引導為另外一種不同面向的人與人的交流方式。主流心理學會把人定義為有病、精神分裂、躁鬱症，用很多標籤來定義自己或他人。在我們這支學派中，我們要挑戰和擊破的就是這種主流方式，我們要尋找新的方式來解釋這種處境，新的表達方式也能引入新的感情感受和感知。其實我們怎麼說、怎麼表達，以至於如何感受、感知在主流的社會中，都會個體化、變成自己和個人的問題；我們恰恰相反，要將之社會化，利用族群團體的力量，看成共同的問題，運用共同力量來創造和尋找辦法。社會治療的基進和進步在於我們對人和事的觀察是有政治性的。我們如何感知週遭的環境和人，是有政治性的；正是因為政治性，我們人才會學會適應這個世界和環境。當我們在看一個人的時候，甚至看自己的時候，看不到全部，是支離破碎的、看不到人的整體性。因此在一個社會治療小組中，我們創造了不同的活動，就是為了促進個別組員能夠用不同表達方式展演不同的自我可能性，在這種展演中找到新的出路。

下一個問題，2003年之前我們這支學派可以訓練沒有正式學歷的社會治療師，但2003年後紐約市法律改變了，讓我們無法訓練沒有心理學學歷的專家。總體來說，社會治療是一種團體和社區治療方式，它是利用各個成員來共同建造一個社群和支持網。反正總之暫且不要說治療，只要將一群人組織起來搞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治療的過程，也能達到社會治療的效果。所以我認為戴老師說線上不同互相支持的程式，都是有用的。我是支持的，雖然它們不是發展人的情感的力量，但是它做到一點，把個人的情感非個人化、非私有化，而是將之集體化和社會化。

針對戴老師第三個的問題。研究者和行動者角色的張力和錯綜複雜的衝突，我覺得唯一而且很容易做到的是研究者要放棄中立，我不相信有中立這件事，因為凡事都有自己的立場。

**夏林清：**

我插一段進來。她講的Community這個詞是群。剛剛依虹有一個好的翻譯是「搞活動」，就是你開始有一些社會性的活動，你去讓人在一起參加活動就自然而然是彼此在關係中，創造機會讓另外一個人發展，自己也得面對很多新的變化。社會治療這個詞我想了好多年，後來只有在一個前提下我才用，就是治療社會，社會治療。我記得十年中，跟萬心蕊、廉兮也討論過，我就是很抵制用Therapy為治療。她剛剛講了一個關鍵的重點的，就是人的經驗都是有社會的，人在社會中的感覺和看法其實都是有，這個社會有很多內外互相約制的，你就這些方式，所以她說你就不要把它私有化或個人化。那怎樣把這個東西改變和變化呢？其實就是要在人的互動裡，往創造、往改變，其實就是將自己投入一個社會改變的過程。所以我到這些年，基本上如果是屬於人的身心變化，我都用「身心復元」。因為我認為在我們的文化裡，人就在天地之間，在自然之間，現代化的這個社會是這麼糟糕，工業化也讓整個必須要承擔很多經驗。所以身心復元是在我們文化裡有的。可是有一點非常重要：為何要治療社會、為什麼社會治療？他們推的這個東西我買帳，因為這是非常基進的政治性的過程。我們的感覺都是有政治性的，你為什麼感覺到沮喪呢、你為什麼看到我們的政局這麼亂的時候你就覺得好心痛哦、為什麼馬英九這麼不爭氣，為什麼......其實這都是有其緣由，它是政治性的。人要破這種政治性，還要能夠讀到、在跟人互動的時候能夠辨認，我覺得這是一個政治學習和政治很重要的一個歷程，這個我覺得是他們也在前進的。那我覺得台灣的社會提供給我們一個幾乎逃不掉的命運，就是必須要在這麼快的混亂中長我們的政治性。這對我們來說還算一個好時機，並不差，雖然我們的薪水很低，年輕人，但這種變動其實是要求你要你能夠看到這種政治性。

**提問與討論**

**潘老師：**

我是來自中原大學的老師，第一個問題是我覺得她的演講裡一個重要的概念是政治、政治化。我覺得沒有辦法理解這個詞的內涵是什麼，所以無法充分理解她的演講在講什麼，希望她能詮釋這個內涵。

**Lois Holzman：**

我覺得總的來說，要認識跟了解我所謂的政治性，要看地境或者語境的。最終要看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階級關係，誰是當權者，誰是被統治的。當權者當然有權力怎樣定義人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定義社會。其實在我們的社會中我們承接了當權者給予我們的概念，這也在心理學和心理治療方式、教育中，很多時候當權者為了要鞏固他們的勢力，他們如何定義我們的感情、概念化我們的感情、和關係，這對於他們來說都是有利，而對我們來說是不利的。

**夏林清：**

她剛說，所有的心理學，甚至包括特殊教育，在社會當中會有一個社會控制或者社會治理。所以什麼是學習呢、什麼是感覺呢、什麼是思緒呢，所有這些定義都具有政治性。這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來從階級政治權力，對治理的權力進行註解。潘老師剛好是德國學特殊教育回來的一個老師。

**潘老師：**

在我們的專業的實作過程中，我們也在權力的地位裡，如果我們不覺知，我們就會有一個角色上的霸凌。就好像是在實務中，如果是一個治療師，教家長要怎麼教孩子，孩子要配合我達到什麼目的。這個過程會讓被我們幫助的人喪失他的主權，主權喪失的時候他就沒有辦法真正發展他真正的實力。我懂了，謝謝。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她現在做的事情是跟特教非常有關係，就是怎樣促進人的發展。人是在社區真實的生活裡來發展的，我好奇要知道她怎樣遊說或者獲得那群人的認可和支持他們願意跟你工作，請Lois用警察和孩子的那個項目來闡釋你們是如何獲得一群人的認同和接納一起與你工作。認同之後怎樣以一種方式來做的，之後又是怎樣發展的？

**Lois Holzman：**

這我可以講一周。這是一個感人的故事。為何能在滿天星這個項目中將警察和小孩聯合在一起搞一個工作坊和舞台劇呢？是因為有一年，你們都知道美國貧民區警察和青年的衝突是很大的，有一個人結婚前一晚被警察誤殺，那個貧民區的人很憤怒，要暴動了。其中一個教授與Fred討論怎麼辦。他們決定利用社區裡各行各業的關係將年輕人拉攏在一起搞活動，都是一些輕鬆愉快和搞怪的，互相扮鬼臉等，結果效果非常好。4年多以來連續組織了100多場工作坊，成果是紐約市的警察部門非常有信心和接受。他們說要正式讓這個警察參加這個項目。

**夏林清：**

有一個發展過程，不是一開始就是清楚的工作坊。一開始是一個社會事件，是一個社會衝突。那個教授是一個發展心理學家，政治事件的領袖，很清楚的社會衝突事件進場，才開始有工作坊。做了很多場，才慢慢走到警察和孩子們互相之間聽或看，然後才到上層的警察領導看。這個我講一個台灣的例子，其實讓我想到當時台灣日日春。在台灣我們公娼運動的時候，我們做了很多文化性的論壇和活動，但是我們也十幾年了，當我們的場——公娼館作為一種歷史建物被認可的時候，又被土地利益、被所謂的投機客把它買走之後，我必須承認我們原來的文化活動有的創造性在某個發展階段是暫停了。我認為她講的一個例子是，他們是一個尖銳的帶來種族衝突的，美國也不是那一次，前一陣子也有在街邊打的。所以一定是有一個具體內部的社會的矛盾，在一個衝突的社會介面中就出現了。那重點是那個時候你踩不踩進去呢？這才是非常關鍵的，這是他們當機立斷的一個某一種政治性，他們的行動就進場，然後再延展和發展的過程。

**張玉華：**

您是怎樣募款的？延續剛才那個話，因為在台灣進去有立場，在台灣會害怕踩進去有立場反而弄不到錢，那你們是怎麼做到有立場，可以在社會衝突裡表達立場、行動還能有錢，讓自己的獨立可以發展下去？

**夏林清：**

我追加一點我的了解。2002年的時候，我去東邊機構的時候，我也很注意知道他們怎麼維持那麼久還能在街頭募款還能持續。回到台灣，我們都要辛苦寫案子才能拿到錢，我稱之為「搶公糧」。政府的錢是人民納稅人的錢，我只有寫案子搶公糧，不然組織者連薪水都沒有。他們建立了一個很有系統的打電話的募款人。第二，可能有一個時代背景，他們在80、90年代募款的對象，他們募款的人可能是60年代嬉皮年代的那一代，那一代可能會看到他們做的，我猜的。第三，他們會把滿天星的孩子怎麼樣有社會運動讓這個成果被具體看到。

**Lois Holzman：**

第一，她講的一個重要的關鍵。把敲門當做一個展演的活動，把向別人要錢不是乞討，一開始覺得丟臉或者幹嘛，反而反過來，而是我們做這件事情是給你了解和參與的機會。紐約街頭很多人是很有錢的，42街青少年900萬的錢是很大一部分來自保守和共和黨的成員，他們不被兩黨政治二分的東西所阻隔。

**夏林清：**

其實我們過去是被敲門所阻隔的，你的不好意思，有一個東西是什麼？台灣我們很多時候是必須寫案子來養我們自己，但是寫了案子之後必須要有一些活動，盡量做一些喜歡的活動。大陸叫「項目」，但是項目將一個組織工作者的創造性已經綁死和殺掉了。

**張玉華：**

我再試著講一段話，算作對話。我還不能很快銜接起來。想到去年身上的幾個經驗片段，去年參選的過程中，我的確不好意思開口募款，一些錢來自於親朋好友，特別是老朋友。有一個印象很深刻，一個錢是透過政治化轉進來。他同時給我跟王芳萍各一筆錢。我們在高雄以「人民民主陣線」參選市議員。這個款住址是高雄一個大醫院。他是個醫生，我們親自去拜訪他。精神科醫生，跟他對話中印象很深刻，為什麼你認識我們。他說透過網路認識我們。他說我是一個搗蛋鬼，我希望這個社會有更多公平正義，所以他捐錢給我們。他很明白我們這樣的人是不可能勝選的。這筆錢和這個拜訪讓我們印象深刻，讓我對台灣的第三勢力有一個信心。

**夏林清：**

明知你不會當選，還是會給你錢，多麼鼓舞啊。這個我不懂，敲門選里長選議員你敢，為何要錢你不敢？

**張玉華：**

敲門是一種爭取支持，要錢我蠻害羞的。第二層是搶公糧，我想練習不靠公糧。我不想再靠公糧了，過去我一手拿你錢、一手跟你打架。現在不想拿了，想要朝向獨立性。我們敢不敢拿？證照的問題。我是一個不拿證照的專業工作者，我覺得相當挑戰念心理學和社會工作的，我覺得除非獨立於證照，丟在旁邊，獨立才有路走。

**Lois Holzman：**

你如果去問一個演員，他是一個害羞的人，如果你問他為何要上舞台，是因為他害羞，所以你需要敲門演出不害羞。很多我們男性的志願工作者募款的時候直接的反應是憤怒，被忽略的時候他的情緒反而是憤怒，我們鼓勵他扮演另外一個角色來完成募款的工作。

**夏林清：**

所以張玉華，我們要做街頭敲門。獨立不靠公糧，明天有一個活動。他是輔大法律性畢業，一個怪異的人類。明天有一些演出，你們可以來玩耍。

**林香君：**

我正在募款中。我的學生說不如我們走出去吧，不要呆在學校裡。我自己想要為我的學生爭取一些資源所以要辦一些研習。把資源要來之後才面對沒錢怎麼辦，但我不能使用課程來讓他們交報名費，所以用募款。我利用了一個協會，是角落，來募款的可能性。我謝謝我們的同學，了解到我的用心，他們很像報名費很像是捐款。我不知道有沒有害羞來跟別人要錢，來自於我自己是勞工家庭出來的孩子，我學校的學生們很多人經濟不見得寬裕，他們很多都是省吃儉用來學習的，當我開口的時候我自己將心比心會想我自己不容易。我主體性療育夠徹底，公共性和法規上立足的時候，我應該面對就要面對。我讓我的同學們知道我前面考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很有可能又被政治鬥爭拿出來被當做一個鬥爭的材料。關於我政治的覺醒，是我關於實踐路線的鍛煉和覺醒。

回到我專業的部分，認識社會治療是從夏老師這邊來的。當時並沒有告訴我社會治療這個名詞，博士論文是在20年以前，那個時候我走上了大學發病，後來療育沒有再發病的經驗。我從來沒有在專業裡懂得為何我會。我在師大，從沒有條件去懂。夏老師給我一個機會，說精神疾病是社會的壓迫，用身心對社會表達抗拒的形式，也是一種展演的形式，那時我懂了。現在不需要解釋它的含義，我馬上懂。我覺得社會視野讓我們了解大的框架，心理學的視野能讓我們看到細緻的個人和家庭的框架，社會治療結合了社會和心理，可以進入一個人辛苦，又可以透過這個人受苦後面的社會結構。所以我這裡才看到了學科不是那麼樣被切割，這樣我才反思自己從師大的訓練，我不再回頭，我走了一條也許孤單但是我自主的路。我很高興剛才聽到了您使用了Mind，Body，Soul，Holistic這些字，因為這就是我後來一路在走的路。我不認為要從西方的心理分析，去依靠他們的專業。他們脈絡裡的知識，我可以參看，但是我要從我的土地和人的、整體的跟我們文化裡面的人去相接觸、去貼近，去磨出來我們的方法。我不要我的學生去重複我以前被殖民的那樣的學習的經驗，所以我沒有走一條選擇諮商證照的那一種學院路線，我很早以前有機會選擇，但我選擇不要，我要走一條專業自主。所以我們走到現在，我認為我的學生們有機會走一條不一樣的。他們有自主覺醒，有助人能力不見得需要證照來支持他自己。也許有同學從不同背景過來，他們會質疑我沒有證照我是專業嗎，我很高興玉華剛剛說的她是一個「沒有證照的專業工作者」，我也是。我也認為我的學生們很多人是，在他們自己的場域裡面開始發揮他們的能力，在這裡我要很謝謝你們。

**夏林清：**

的確，香君她講做學生的時候我還不知道社會治療是什麼東西。與其說我是在唸心理學認識Lois的，不對，其實我在社會運動中引領我比較確認人要怎麼樣長出他自己的能耐，怎樣知道那種社會的壓迫跟人的發展是怎麼關聯性的，我是這樣才找到才去看一群奇怪的也有心理學也有社會工作的，然後認識他們的。香君剛剛在講很多人共同的一點，美國2003年以後不能進行證照訓練，但這就是主流社會設計的，那我們怎麼辦呢？其實今天的場已經是社群發展了，我們大概辦一些這樣子的交談論壇活動，我們差不多都會有不同的群體聚集在一起，這就是我們的社群。

**許育光：**

我是輔仁畢業之後，跟香君老師剛講的是對立面，有很多執照。我在新竹教育大學任教。30歲經歷到一個很大的痛苦是，進入心理諮商專業系所教書，躺在床上有很大不安。課堂上坐著一大堆小你幾歲的孩子，他們都不斷的抄你講的話，他們認為抄了你講的話就會做。這並不是一個訓練工作者要做的一個工作方式，所以三年前我到社會治療學院裡去上一些課，給我很大的震撼。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Fred那裡，剛好他過世。我參加了一個十幾年的團體，我本身教團體諮商，非常興奮參加這樣一個團體。我的感覺是那裡團體成員比任何一個治療師還懂治療。在社會治療工作裡面的訓練裡，基本上是訓練自己成為自己的治療師。我本身是醫院臨床，當中無論有病沒病，每個人都有能量和動能去幫助自己幫助別人，當你想要成為一個治療師或是不要成為治療師。帶著這些我比較懂從大學時代上夏老師的課所帶來的東西，之後開始找自己的定位，比較實在的師徒關係，某種程度跟學生的對話方式挪移自己的位置，有點像心理諮商師的罐頭工廠，怎麼樣去找一個自己的位置。這是跟大家分享的，非常興奮Lois到這邊來。

**佩君：**

剛才玉華的害怕，我想一定要起來發言。因為我在看《成長的校園》的時候，其實我很難過。它裡面有一個提問，說如果不支持發展的校園，這些老師該怎麼辦。在台灣的特教剛好是書裡寫的最糟糕的狀況，同年齡放在一起，在我學校都是這麼做。剛開始覺得很無力，後來我上香君老師課，覺得自己有語言障礙和發言障礙，後來我認識自己。到後來跟著「異人算障團」，在成長的校園中，我不懂發展、展演是什麼意思。今天下來我開始懂，我開始展演一個不一樣的自己，就是更知道社會治療是什麼東西，不管是跟社群、還是不管是跟哪個團體、跟不一樣的老師、學生交互討論，從我自己的去年暑假的「新北市過動兒童的篩檢」，對我而言雖然我反對用藥，但是我不敢說、到我怕的要死、到我開始跟學生討論，我開始從權威指導性非常強的角色，轉到我開始好奇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到底在這個體制裡發生什麼事。他開始跟我談還談得好細膩。我發現其實當我的對話讓學生在理清這個是什麼，已經在做這個，如果我們不用藥，我們可以怎麼做。有些孩子跑來說「還是用藥好了，因為我媽媽都讓我用」。我感到很失望，但是我還是繼續在那邊工作，但是會感覺到體制內的老師在瞎摸，有時候繞圈圈，可是願意做改變，有社群的發展很重要。就是分享這個部分。

**夏林清：**

Lois和戴老師回應一下。我把佩君的說一下，去年我們成功的把過動兒和把體制內的特教老師，後來延伸到輔大應用心理學會辦了一場論壇，把用藥這件事用了新北市行政命令判定多動兒要用藥這件事情停住了，不會用行政命令下來。這個是佩君講的。她開始在她的一個制度內的一個特教老師，完全覺得是被捆綁住不太有發展的機會，但事實上是可以往前的，也許是細縫，可是那裡面是可以產生變化的。

**提問者：**

我是基層護理產業工會新的理事長。今天談的，我個人有護士執照，護理師執照，心理師執照。我覺得人的生活和健康疾病不該是那樣子的，所以沒有進入那些場域。在人生的摸索階段，遇到夏老師和她的工作方法。我在工傷協會，跟不同群體碰撞的經驗讓我開始重新思考什麼是醫療，什麼是人的生活。我覺得這個經驗對我是重要的，這個帶回來當我組織護理工會的時候，是重要的。因為作為工會，他很容易被侷限在勞動權，很少反思自己在國家和社會中的角色。剛才很多社工和心理在反思自己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環，可是我認為在醫護人員這部分是很少的，太忙於急救病人了，就此時此刻在我眼前。但是就像剛剛那個老師說的，如果這個社會不支持人的成長和發展的環境的話，老師到底該做什麼。我覺得至少在我看來此時此刻在台灣這樣子的問題，我們的政府不斷在製造過勞，食品安全，我作為一個醫護人員，我永遠永遠都在做一個比收屍體更好一點點的角色而已。我覺得這是一個沉重的問題。我覺得工會這樣一個組織有機會跨出這個，讓我們跟其他社會運動群體交流。我第一次帶他們去觀察絕食的現場，那是一個有趣的經驗，其他人在絕食的時候，那些人在關懷那群工人、勸他們回去，但我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作為我的專業，我可以做到讓一個病人血糖控制的這麼好過。這個過程中只是透過喝水按摩，高血壓控制的非常穩。那對我來說，是一個有趣的經驗。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醫院，他們跨出了醫院的場之後，他們在自己的生活裡談醫療是什麼，生活是什麼。他們跨出了醫院的場地之後，跟一般人談我們的需要的醫療和生活是什麼東西。

**夏林清：**

聽起來這是一種反向創造性的發展。把護理帶到現場反而讓他經驗到他的身體和他自己的關係，和他自己的立場要做的這件事情。

**戴伯芬：**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者，我想要回應在場一些朋友的經驗。第一個，募款，我覺得募款這件事情在台灣這個社會是跟議題有關係。有過一次募款，非常訝異不到24小時都會募到100多萬，很訝異台灣人怎麼這麼有錢。作為一個都會的國民但是很愧疚將垃圾放到原住民區，很多人都有贖罪的心態。在受苦受難的群體中，如何透過剛才Lois說的展演，這些受苦的經驗不是個人化的，不是躲在自己家裡，躲在黑暗的角落哭泣而是必須走出來被看到，拿到一些支持。另外一個，搶公糧不是一個好的策略，為了搶公糧忘記當初到底要幹什麼事情。透過一些具有文化創造力的東西，反而可能會是一個長久的路，我對這條路徑比較有興趣。

**Lois Holzman：**

我覺得今天經歷的就是這樣一個場域，所以我是激動的、被培育的，覺得很精彩。今天我們有一種展演的性質所在。想要做一件事情。滿天星的執行長，他是一個非常有能耐的募款人員之一。他說我們要脫離慈善救濟的概念，而朝向一個成長發展的過程和培力。我這裡有一些訊息是關於我們東邊研究所的培訓的訊息。

**Lois 朋友：**

跟Lois這麼多年都一直在做組織社群的工作，在今天的現場中她清楚的經驗到社會治療裡面的一個重要的精神就是冒險。去做沒有做過的事情，剛剛像敲門，去做任何跟他要，跟你一道把事情發展出來的機會，就是去做，敢冒險，去做我們沒有做過的事情。

**夏林清：**

我記得我在紐約的時候，他們也跟我說「你在團體中，你在街頭，你就去做你沒有做過的事」。可是我們老是會想，那我要怎麼做。其實就是冒險，不要怕狼狽，就去做它。好，那我們就再來創造機會給我們彼此。

再度宣傳一下Lois這本書《成長的校園》，Lois問我為何要選擇這本書。我今天在現場聽到三位青春不再的我們老師們發言的時候，這正是一種教育學習的一本書。在台灣社會，主流和某一種規範性的做法其實都在我們身上有痕跡，所以可能這本書其實是好的。所以我們來讀它，再來一起創造，昨天才印好的「熱的番薯」。（記錄：王東美）